

中印文化交流丛书

Series of Sino-Indian Cultural Exchanges

主编 王树英



中印文化交流与比较

Sino-India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mparative Study

王树英 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10796/12

中印文化交流丛书
Series of Sino-Indian Cultural Exchanges

中印文化交流与比较 王树英 编
Exchange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Cultures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印文化交流与比较/王树英编.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10

(中印文化交流丛书/王树英主编)

ISBN7-80074-880-4

I . 中… II . 王… III . ①文化交流—中国、印度②文化—对比研究—中国、印度 IV . G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5951 号

中印文化交流丛书

Series of Sino-Indian Cultural Exchanges

王树英

总序

两年前,我又去印度考察了十几个城市和乡村。所到之处,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曾与印度学术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学术交流,有些学术报告还在报刊上发表了。出我意料的是,文章刊出之后,在印度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例如《中国人眼里的圣雄甘地》一文在一家报纸发表后又有三十多家报纸转载,时间持续两个月之久。受到印度人民如此欢迎,本人深感振奋。高兴之余,浮想联翩。此事说明中印两国人民很想彼此加深了解。我想,若能再写一二本有关中印两国的小书实是好事,作用更大,甚至能出一套《中印文化交流丛书》岂不更好?

说来也巧,正当我要联系有关丛书出版事宜时,中国华侨出版社的同志找到了我,我谈出自己的想法和打算。他们首先

果断决定出版本套丛书。我认为该出版社是有远见、有胆识、不唯利的。

文化交流能促进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前进。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文化交流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个国家的文化或文明，要继续发展，不断前进，内因当然是决定因素，但外因也很重要，有时甚至会起决定性作用，而文化交流则是一个重要的外因。中印两国文化发展史的本身就是很好的证明。中印两国为近邻，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皆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几千年来，两国人民彼此交往，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对各自的文化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当前，中印两国友好关系正在不断发展，两国人民对此由衷地高兴。为了更好地建设各自的国家，目前彼此学习、相互交流显得更为重要。本人在与中、印人民的交往中，深切地体会到，中印两国虽互有了解，但还很不够，这个事实恐怕谁也不能否认。因此，前些年印度外长来华时曾说：“作为近邻，双方了解还非常不够，真是憾事。”所以他建议扩大交流，增加往来。我想“友谊”是随着相互不断了解而逐步加深的，彼此向对方学习的东西也会更多。为了有助于中印人民相互学习和友谊的不断增长，把各自的国家建设得更好，中印两国学者都为此共同努力，愿献出一点微薄的力量，《中印文化交流丛书》的撰写和出版就是一例。我们的工作若能起到一点积极作用，也就心满意足了。《丛书》共有 10 本，将陆续出版发行。

本《丛书》的作者们都是多年一直从事某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且有精深造诣，多数在对方国家曾作过深入调查（即

中国作者去过印度多年，印度作者也来中国呆过很久）。所以他们既有理性知识，又有亲身感受。尽管如此，每个人的著述也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有关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最后，感谢印度驻中国大使馆特别是文先杰先生在我们组织本套丛书过程中所给予的热忱支持和协助。

1993年12月16日

前 言

印度和中国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两国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两千多年来，两国人民相互交往，彼此学习，在各自文化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自古以来，中印两国彼此之间到底是如何交往、如何学习的，以及对双方的影响如何，目前仍是中印两国人民关注的问题。我们的前辈、长者，以及当代年轻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已有不少有关专著、文章先后发表问世，受到了中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些对中印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彼此学习，对两国文化交流和比较研究，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今天两国人民对此并不满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前进，两国人民都想更多地知道对方的过去和现在。因此，中印文化交流与比较的研究就显得更加

重要。目前处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亚洲各国的经济近年来正在迅猛腾飞。经济的迅速发展与文化密切相关。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有文化的更大繁荣，进一步推动亚洲各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而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其中将充当重要角色，成为推动亚洲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一发展趋势，正越来越成为世人的共识。现在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渴望更多地了解印度，同样，越来越多的印度朋友也渴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为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印两国学者的一些成果正在陆续出版问世。与此同时，我们也把分散于不同刊物中的文章选编成册，整理成书，以便于读者查找翻阅，但愿它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只因受字数的限制，有很多很好的文章未被收入其中，实为憾事。不过，我们想，待有机会，再出续集。

1994年6月

目 录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季羨林	1
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	季羨林	34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赵朴初	89
中印文化的交流	常任侠	97
三谈比较文化	金克木	114
古代中印历史文化关系考略	王树英	121
从“酉阳杂俎”看中印文化关系的交流	薛克翹	142
郑和与南亚	刘如仲	161
中国史籍中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考	谢 方	182
老子与印度	薛克翹	192
论佛陀与孔子的道德观	崔连仲 武 文	204
印度和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某些异同	刘安武	222
中印古代寓言比较	王树英	244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泰戈尔热”	张光璘	259
泰戈尔与中国文人	徐 坤	276

CONTENTS

An Inquiry Into Time and Place of Chinese paper and paper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Entry Into India by Ji Xian Lin	1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Introduction of Chinese Silk into India by Ji Xianlin	3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ddhism and Chinese Culture by Zhao Puchu	89
Sino—Indian Cultural Exchanges by Chang Renxia	97
A Third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es by Jin Kemu	114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Indian Ancient Cultural Ties by Wang Shuying	121
Sino—Indian Cultural Interchange: Gleanings from You—Yang—Za—zu by Xue Keqiao	142
An Account of the Voyages Managed by Zheng He by Liu Ruzhong	161

The 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 in Chinese Historical Works	by Xie Fang	182
Laozi and India	by Xue Keqiao	192
Buddha and Confucius; Their Ethics	by Cui Lianzhong	204
Som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Literary Traditions	by Liu Anwu	222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and Indian Fables	by Wang Shuying	244
Tagore Craze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by Zhang Guanglin	259
Rabindranath Tagore and Chinese Literati	by Xu Kun	276

季羨林

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 的时间和地点问题

纸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发明对人类文化传播与推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计量的。^① 在中国，有了纸，才有印刷术的发明；有了纸，才能大量地抄书藏书印书，书籍才能流通，文化才能传播；有了纸，在世界艺术史上放一异彩的中国绘画才能得到蓬蓬勃勃的发展。纸对世界文化的贡献也是同样大的。传到欧洲，就助成了世界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复兴

① 关于中国纸的历史参阅桑原隣藏《东洋文明史论丛》、《纸の歴史》，内藏虎次郎《东洋文化史研究》《纸の话》；劳干：《论中国造纸技术之原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九本；傅振伦：《中国纸的发明》，《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八月；袁翰青：《造纸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科学通报》，一九五四年十二月号；王明：《蔡伦与中国造纸技术的发明》，《考古学报》，第八册。

和宗教改革，促进了社会的进化。^① 这一点连欧美资产阶级的抱着根深蒂固的成见学者也不能不承认。这些学者一向是努力抹煞中国古代伟大的发明的，抹煞中国人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的，譬如对罗盘针、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他们都竭力加以曲解，不惜歪曲事实，把发明的光荣从中国人手中夺走硬扣到自己头上。独独对于纸的发明，即使他再不甘心，却也不能不在事实面前低头。^②

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一〇五年)蔡伦^③发明了以树皮、麻头、破布和鱼网造纸的方法以后，很快地就在中国传播起来。以后逐渐传到现在的新疆，从新疆传到阿拉伯，又从阿拉伯传到非洲北部、西班牙，更从非洲北部、西班牙传到欧洲的意、法、德、奥、瑞士、英、荷等国，终于传遍了全世界。中国纸和造纸法的传布史是一个极大而又极有意义的题目。我在这里只想从这个大题目里选出一个比较小的题目来，谈一下中国纸和造纸法是在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传入印度的问题，一个过去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④ 目的在给中印两个伟大民族的文化交流再多提供一些事实，把中印关系史上这个重要的空

① Th. Lindner,《世界史》，第四册，第八节。

② Thomas Francis Carter,《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New York,1925年,第一章。

③ 《后汉书》，卷一百八，《蔡伦传》说，“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和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东观汉纪》卷二十《蔡伦传》注：“案一本作伦典尚方作纸，用故麻名麻纸，木皮名谷纸，鱼网名网纸。”实际上，这种造纸的方法可能已经在民间肇端，蔡伦只是把这方法提高了一步，集其大成。《书斋占毕》卷二，纸笔不始于蔡伦蒙恬：“又如蔡伦乃后汉时人，而前汉《外戚传》云：赫蹄书，注谓赫蹄乃小纸也，则纸字已见于前汉，恐亦非始于蔡伦。”

④ 印度学者 P. K. Goode 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纸输入印度的论文：《中国纸输入印度考》(Migration of Paper from China to India),1944,但不详细。

白填补起来。

印度古代的书写资料

印度古代是没有纸的。中国在发明纸以前是用丝和竹板等作书的。印度有时候也用木板和竹片，但不像在中国这样普遍。他们常用白桦树皮，梵文叫做 bhūrja (Baetula Bhojpatra)。喜马拉雅山下有极大的桦树林，所以在很早的时候，印度人就知道用这种东西，亚历山大侵入印度时，他们已经用了。在梵文古典著作里常遇到 bhūrja 这个字。这种树皮有时候就干脆叫做 lekhana, lekhana 最初是书写资料的意思，纸输入后，也用这个字来称呼纸。可见桦树皮应用之广。第十一世纪游历印度的阿拉伯旅行家贝鲁尼 (Alberuni) 在他的游记里提到这种树皮。他说，在中印度和北印度，人们取长一码宽约五指的一块 bhūrja 皮，加油磨光，磨得硬而滑，然后就在上面写字。^① 这种做法大概源于印度西北部，传到东部和西部。在中亚细亚发现的所谓包威尔写本 (Bower - MSS) 是用白桦树皮写成的。现在伦敦、牛津、浦那、维也纳、柏林等地图书馆里都藏着大量的桦树皮写本。

其次是用压得发亮的棉织品。间或也用皮子和羊皮。利用金属的也有。比较普通的是铁板和铜板 (tāmrappaṭa, tāmratattra, tāmrasāna)。法显《佛国记》：

“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给

^① 贝鲁尼：《印度》(Alberuni's India), ed, by Dr. Edward G. Sachau, London 1914, p171.

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①

“然后割给民户田宅，书以铁券。自是已后，代代相承，无敢废易”^②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

(迦腻色迦)王以赤铜为牒，镂写论文，石封函记，建大窣堵波而储其中。”

也有用铜板刻镂文学作品。用金银的比较少。宋《高僧传》卷二，《善无畏传》：

“复锻金如贝叶，写《大般若经》”^③

正如在中国一样，石头也有时用来刻字。

但是最常用的还是一种树叶。这是一种大叶棕榈树，
tāda-tāla (*Borassus flabelliformis*) 或 tāda-tāli (*Corypha umbraculifera*, C, *taliera*)。贝鲁尼在他的游记里说：

“在印度南部有一种细长的像枣树和椰子树一样的树，结实可吃，叶长一码，有并排起来的三个手指头那样宽。这种树的叶子叫做 tāri (tāla 或 tār)，就在上面写字”^④

tāla，中国旧译“多罗”。《翻译名义集》卷三：

“多罗，旧名贝多，此翻岸。形如此方棕榈，直而且高。极高长八九十尺。华如黄米子。有人云：一多罗树高七仞。七尺曰仞，是则树高四十九尺。《西域记》云：南印建那补罗国北不远有多罗树林，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

① 《大正大藏经》，卷五一，859页中。

② 同上书，50卷，855页下。

③ 《大正大藏经》卷五〇 714页。

④ 贝鲁尼：《印度》，p,171。

不采用。”^①

“多罗”既然是 tala 的音译，那么为什么又说：“旧名贝多”呢？原来这里面有一个误解。“贝多”是“贝多罗”的缩写，就是梵文 pattra 或 patra 的音译（巴利文是 patta）。本来的意思是叶子。在《摩诃婆罗多》（Mahābhārata）、《摩奴法典》（Manusmṛti）等书里都是这个意思。在比较晚出的著作里，象诗圣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②，《五卷书》（Pañcatantra）等，才逐渐有了专门作为书写用的树叶子的意思。随着佛教的输入，这个字也传到中国来，就是大家都知道的“贝”叶。“多罗”和“贝多罗”在原文里区别固然很大，但是在中文里却只有一字之差。两个词的涵义又差不多完全一样，所以一般不懂梵文的和尚就把两者混了起来。还有人更进一步加以曲解说，“贝”是叶子的意思，多罗树的叶子就叫做“贝多罗”，完全是无稽之谈。

印度古代，正如中国古代一样，读书多半是师弟口传。但是中国发明了纸以后，可以大量钞书，这种风气就逐渐减少。印度却一直维持下来。法显《佛国记》：

“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③

“亦皆师师口相传授，不书之于文字”^④

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

“咸悉口相传授，而不书之于纸叶”^⑤

① 《大正大藏经》，卷五四，1102页。

② Richard Pischel, 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Kalidāsa's Śakuntalā),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vol. 16, 1922, iii, 18, 3—4.

③ 《大正大藏经》，卷五一，页八六四中。

④ 同上

⑤ 同上书，卷五四，229页中一下。

可见这种风气维持之久。间或也有写下来的，但是数量极少。在这极少的数量中，贝叶占绝大部分，特别是佛教经典更几乎全为贝叶所垄断。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三的记载，佛教徒第一次集成的佛经就是“书之贝叶的。”^①以后中国和尚到印度取来的佛经，印度和尚送到中国的佛经，几乎都是贝叶经：

唐道宣《续高僧传》卷一《菩提流支传》：

“三藏法师流支房内经论梵本可有万夹”^②

《真谛传》：

“余有未译梵本书并多罗树叶，凡有二百四十夹。”^③

卷二《那边提黎耶舍传》：

“三藏殿内梵本千余有夹。”^④

《彦琮传》：

“新平林邑所获佛经，合五百六十四夹，一千三百五十余部，并昆仑书，多梨树叶。”^⑤

卷四《玄奘传》：

“贝叶灵文，咸归删府。”^⑥

宋《高僧传》卷二《无极高传》：

“永徽三年壬子岁正月，自西印度赍梵夹来届长安。”^⑦

① 同上书，卷五〇，238页上。

② 《大正大藏经》卷五〇页四二八下。《佩文韵府》，卷一百六：“梵夹，见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所以贝叶经都以夹计。“夹”有些本子作“甲”。

③ 同上书卷，430页中。

④ 同上书卷，432页下。

⑤ 《大正大藏经》，卷五〇，437页下。

⑥ 同上书卷，456页下。

⑦ 同上书卷，718页中。